

重庆开埠前川东地区的商品市场

周琳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市 100084)

摘要:以重庆开埠前的川东商品市场为研究对象,对于流入和流出这个区域市场的大宗商品进行了考察,展现出一个门类齐全、容量巨大、购销两旺的商品市场。同时也总结出这个市场的发展中存在的两个问题:即过分依赖农副土特产输出以及与其它区域市场的商品贸易来往显得比较内向和被动。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与清代中前期川东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关键词:川东地区;重庆开埠;商品市场;输出口;输入品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4-0053-06

本文所指的“川东地区”,是指嘉陵江下游地区和重庆以东,以万县为中心的东南长江流域一带。清代,随着长江航道成为贯通中国东西各区域间贸易来往的交通动脉,这个地区的市场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而本文即是从商品贸易的角度对这个市场进行考察。根据流通方向的不同,本文将重庆开埠前的川东商品市场划分为“输入品大宗”和“输出口大宗”两个部分。希望通过对这些商品的结构和数量分析,理解这个市场的发育程度、内在机制和时代特征。

一、输出口大宗

(一)粮食

清初,由于移民的到来和垦荒政策的实施,四川的粮食生产迅速增加。雍正五年,浙江总督李卫奏称:“各省米谷,惟四川所出最多,湖广、江西次之”^[1]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三日浙江总督李卫奏。雍正四年,闽浙总督高其倬也曾说:“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而湖广又仰给于四川”^[2]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高其倬奏。可见至晚到雍正年间,四川就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境内一个新的粮食生产基地。对于清代川粮外运的具体数量,学者们考证的结果各不相同,王笛根据乾隆年间四川人口、耕地、粮食总产量及消费量,估算出当时四川的余粮“除去留作他途和运

往滇黔外,每年能够沿江东下的大概有150万石”^{[2]207}。邓亦兵根据夔关所征收的粮税数额断定“乾隆时期,川粮外运年平均在300万石以上”^{[3]82}谢放则认为,雍乾时期四川粮食外运量最多的时候,“每年500—1000万石也是有可能的”^[4]。另外,王纲全面辑录了《清实录》和嘉庆《四川通志》中所记载的川粮外运的具体数字。依此计算,从雍正四年至嘉庆十一年,仅有数据可考的外运数就达到9,518,480石,其流入的省份除上文所提及的两湖和江浙以外,还包括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北京、山东、安徽、福建、台湾诸省区^{[5]575-577}。总而言之,无论上述那一家的说法,都足以证明清代前中期川粮外运的数量是极其可观的。

当然,从流通的角度来看,这些粮食中的相当一部分属于“官买官运”或“官买商运”^①,其调拨、购买、运输和发放等环节不同程度地为政府所左右。但总的来说,米谷的价格和调运量仍然是由市场决定的。另外,随着川粮外运量的增加,政府也越来越倾向于以自由贸易的方式实现省际粮食调配,准许米商在四川的集市和官仓购买粮食,自行外运。而且乾隆帝还屡下诏旨,蠲免运粮船的关税,并禁止沿途税卡的官员拦阻粮船^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清代四川米谷贸易的顺利进行。

由于川粮输入量最大的省份几乎都位于长江中下游

① “官买官运”即粮食的调拨、购买、转运、发放等程序,完全由四川或受援地方政府组织进行;“官买商运”即由四川产粮州县准备好米谷,由商贩向官方购买,运往缺粮地去发售。

② 《清实录》,乾隆二年丁巳五月二十四日载:“米谷为民食所资,与他货不同。请嗣后征米税船料各关,除丰登年岁照例征收外,倘遇水旱地方,其附近省份各关口,令该督、抚将被灾情形具奏,请旨宽免,凡米船一到,即便放行。”

收稿日期:2008-05-10

作者简介:周琳(1980-),女,重庆市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清代四川盆地区域社会经济史。

一带,因此,当时四川省大部分的外运粮食都要运送到川东市场上进行中转。而作为长江航道水路运输枢纽的重庆便成为出川粮食的“换船总运之所”^{[6]卷三·积贮}，“米客之汇于渝者，觅朋托友自为采巢，颇称便利”^{[6]卷三·课税}。而位于长江航道上的夔关，也是当时四川境内唯一一个以征收粮税为主的榷关。据邓亦兵统计，自乾隆19年至乾隆45年间，夔关年平均征收粮税达26,248两^{[3]381}，约占其每年税收正额的1/3。可见在重庆开埠前，川东粮食贸易确曾盛极一时。

然而，从嘉庆中期开始，随着人口的增加，川粮外运量逐渐减少。尤其是咸丰、同治年间，罌粟种植在川东地区恶性蔓延，使当地的粮食产量锐减^{[7]83-87}。许多原本向外输出粮食的地区变成缺粮区。但无论如何，粮食贸易在清代中前期几十年的时间中，的确曾经是川东商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食盐

川东也是清代四川的盐区之一，其盐业资源主要分布在峡江地区，以云阳、大宁、开县三地所产最多。云阳盐场在其最盛之时开井133眼，烧灶357座。日产盐可达35万斤^{[8]卷二·第三篇《运销》}，大宁和开县盐场的规模也大约与之相当。这三个县的盐场所生产的食盐，除供应本省的巫山、万县之外，还可以销售到鄂西的恩施、宣恩、利川、建始、鹤峰、长乐、咸丰、来凤、秭归、兴山、巴东、长阳等十二个县^{[8]卷二·第三篇《运销》}。其余如彭水、大足、奉节、万县、忠县等在清代也陆续有盐井开出，但所出盐质量不高，产量也不大，仅供本地食用而已^{[8]卷二·第二篇《场产》}。

川东市场也是大部分川盐进入长途贩运之前所必经的中转站。以当时的五个“边岸”（即滇黔两省依靠川盐为食的地区）为例，尽管其所配盐场为川南的富荣和犍乐，但除滇边岸（云南昭通府、东川府、镇雄州及宣威州）可直接从川南的泸州运赴目的地外，黔永边岸（贵州大定、安顺、兴义、普安）、黔仁边岸（贵州仁怀、遵义、大定、贵阳）和黔綦边岸（贵州遵义、贵阳、都匀、平越）都必须从毗邻重庆的綦江转船，而黔涪边岸（贵州思南、思州、镇远、石阡、铜仁、松桃）更需从重庆运至涪陵，再从涪陵经乌江航道运出。由于运输量的巨大，乌江上的“歪屁股盐船”常年络绎不绝^{[9]90-93}，而为了方便转运，沿岸的黔江县羊角碛镇，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就已经有川东商人所开办的裕华、福德、裕川、新兴正等十大盐号^{[8]386}。而咸丰年间“川盐济楚”实施后，川楚之间的食盐转运更是为川东地区所垄断。据估计，当时沿长江而下进入湖北的食盐“旺月每月约合川省水引900余张，若以衰旺之月折中为800引，按道光三十年定章，每水引一张计巴盐8000斤，花盐1万斤，以花巴各半折9000斤计，月销川盐当为720万斤，年销额应为8,640万斤左右，这还不包括无法计算的私盐在内”^{[2]199}。

需要说明的是，在清代前中期的川东市场上，食盐贸易固然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但绝不能将其作为一般商品视之。因为食盐作为一种商品，有着它与生俱来的局限性。首先，一个地区是否生产食盐并不取决于该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也不取决于当地的技术水平，而最终只取决于这个地区有没有盐业资源。从这个意义上看，食盐生产实际上有一种靠山吃山的意味。另外，因为每个人每天所吃食盐的量是相对固定的，所以除非人口发生大幅度变化，一个社会对食盐的需求量也是相对固定的。因此，它无法像其它许多商品那样拉动市场、刺激消费。而最关键的是，清代的食盐贸易始终为国家专卖所垄断，其生产、运销和定价无不受到人为因素的控制，从中很难看到市场自身的动力。因此，尽管食盐贸易为这一时期的川东市场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利润，但对于市场机制的深层影响却比较有限。

(三) 其它商品

此种商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不经加工或仅经初级加工的土特产，诸如山货、药材等，第二类是经过比较复杂的加工程序的手工制成品。

前一类商品大多出产于川东周边的山区，如峡江地区和西秀黔黔地区即以盛产桐油而著称。在同治年间，位于川江航运孔道的万县就已是“民多种桐，取其子为油，盛行荆襄”^{[10]卷十三《地理志·物产》}。而秀山县所出产的“秀油”更是闻名遐迩。据记载，光绪初年，在秀山县城关就出现了以经营桐油为主的八大商号，俗称“八大家”。该县最盛年的桐油输出量已达到14万桶（每桶重60多公斤）^[11]。可见，桐油已经成为该地区的大利之所在。此外，巴山老林出产的药材也颇受省外市场的欢迎。如城口厅在乾隆年间“山中野（厚）朴树大数围，皮厚数寸，人家往往以之盖屋”，而到了嘉庆年间，由于连年的大量输出，山中的野生厚朴已越来越少，“皮以一二分厚为止，亦不恒有”^[12]。由于野生药材的减少，该地商民还将药材栽培发展成为一种地区性的产业。如黄连种植在嘉庆时期即已上升到“厂”的规模，“一厂辄数十家”^{[13]卷九，《山货》}。

与经营农产品和手工制成品相比，土特产贸易有着独特的优势。它的采集、生产和加工一般不侵占耕地，对资金、人力和技术也没有苛刻的要求，而且它浓厚的地方特色还极大地减少了市场竞争的压力。因此，对于清代的川东地区来说，土特产的输出显然是一条更加便捷的生财之道。

后一类商品大多出产于重庆府及其附近的一些州县。如荣昌的麻布织造业就十分发达，在同治年间已是“比户皆绩，机杼之声盈耳，富商大贾购贩京华，遍逮各省”^{[14]卷十六，《风俗》}。而该县生产的纸扇也十分畅销，“邑中职此业者不下千家万户，每年春间各郡县客商集于斯，贩往他处发卖”^{[14]卷十六，《物产》}。又如梁山县的竹帘，“以竹破

为细丝,织轿帘、灯帘、帘幕,各色俱备”至今都颇负盛名^[15]卷四,《食货志·物产》。另外,大足的日用小五金生产也十分引人注目,到光绪初年时,已经形成了剪刀、剃刀、铁锁、熟铜制品、烟斗、大炉、条铁等接近二十个生产门类,其产品远销陕南、陇东、云、贵北境^[16]382-383。

另外,重庆还汇聚着许多来自于其它地区的特色产品。乾隆年间的重庆城就已经是“昭文则有丹漆旄羽,制器则有皮革骨角,取材则有楠梓竹箭,利用则有鱼盐旃裘,漆丝纁纁,若铜、若锡、若铁、若怪石、若金玉器玩、佳果香茗,或贩自剑南、川西、番藏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之间”^[6]卷十,《商业》。这些商品除了供重庆市场消费以外,大部分将与川东本地土特产一道,或溯江而上,进入滇藏川西北市场,或沿江而下,流向中国长江中下游、闽粤甚至北方市场。

(四) 鸦片

在清代川东经济中,罂粟种植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道光二十六年,涪陵初次有了大面积种植罂粟以牟利的记录^[7]4。咸丰十一年,英国人布拉斯基顿乘船上溯长江时,看见罂粟已成为“川东沿江地区普遍种植的农作物了”^[17]46-47。而到了光绪十七年重庆开埠前,整个川东的罂粟种植亩数已达到100多万亩^[7]15。据《重庆海关1891年调查报告》,在重庆开埠以前,川东经济区每一个州县的鸦片产量都在1000海关担以上,而作为川东鸦片生产和集散中心的涪陵,年产量甚至达到每年9263海关担。1880年重庆土厘局征收的鸦片厘金高达每月银1400—1700两。难怪该报告的作者惊呼:“此一商品的税收足以使本省向来所收一切捐税黯然无色”^[17]45。

鸦片的大规模贩运暴露了存在于当时川东经济中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当地农业生产收益的低下。重庆海关首任税务司霍伯逊曾将种植罂粟和种植小麦的收益作过一个对比,结果是:在同样一担地^①上,种植罂粟的利润为制钱11000文,而种植小麦的利润仅为制钱6000文^[17]48-49。正是这种巨大的利润落差,诱使当时川东地区的许多农民弃粮种烟。另外,是输出品价值难与输入品价值相抗衡的问题。上文所述及的粮食、食盐、山货、药材等大宗输出品,基本都是体积大、运输困难、价值低

廉的商品。在清代中前期,从外地市场输入商品有限的情况下,尚不至于出现明显的不平衡。但到同治时期,随着从长江下游进入川东地区的商品日益增多,川东市场上输出品与输入品之间的价值落差随即变得越来越大。正如涪陵地区的方志中所以说:“同治中海禁开,洋货充仞,纱布糖油入中国,沿江上溯,土物不能抵制,利益于外,惟罂粟用抵印度土,岁入数百万,竟趋之”^[18]卷十八,《食货》。可见,种植罂粟对于当时的川东地区来说,实在是一种弥补贸易逆差的权宜之计。

不可否认,鸦片输出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上述问题,但它却从根本上败坏了这个地区的经济机体。一旦政治环境和国家政策发生变化,必然会带来整个地区经济重心的坠落。清政府禁烟后川东农村的普遍萧条便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输入品大宗

(一) 棉花

清代,棉布已经成为川东居民普遍穿用的服装面料。据《永川县志》记载:“旧之男子衣布,女亦如之,缙绅先生每有衣大布经浣洗者。惟富家颇尚都丽,然亦十之一二”^[19]卷二《舆地·风俗》。而大宁县也是“乡民服皆布为之,冬用棉袄,妇女多用手帕缠头”^[20]卷一,《地理·风俗》。可见,在当时川东居民的服装消费中,购买棉布和棉花已成为一项主要的支出。据曹树基对清代四川人口的分府考订,在嘉庆二十五年时,川东经济区的人口约为760.3万^[21]286-294。以每人每年需布3丈计^②,整个川东经济区每年大约需布2281万丈,约和684万匹,大约需皮棉855万斤^③,即8.55万担。

清代的川东地区也不乏有种植棉花的记载:如梁山“所产不若江南之盛,在川东为最饶”^[15]卷四《食货志·物产》。达县“所出者曰土花,清代农家无不种植而采取之,后弹之成絮,搓之成条,纺之为线,织之成布,用絮以着衣,较广花西花柔软而温”^[22]卷十三《食货门·制造》。然而,这样的县份毕竟是少数,从总体上看川东本地的棉花产量仍属极为有限。吕平登在《四川农村经济》一书中,曾列举了四川省棉产量较大的县份共31个,其中位于川东经济区之内者仅有大足一县。且其年产仅为30担,居于此31个产棉

① 在当时的四川,习惯上以土地的年产量,而不是面积作为其度量单位。

② 侯建新认为,清代江南人洪亮吉所说:“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是指一个壮劳力或生活条件较好的人的生活标准,按普通标准或一般经验,包括被、鞋、袜用布,并男女大小口混算,一人年所需大约3~4丈布左右。而清代四川农民的生活水平较江南为低,且川东的荣昌、永川、垫江、丰都等县份都盛产麻布,所以棉布用量一定较江南少一些。因此,在没有更具说服力的数据的情况下,暂以江南人均消费棉布的最低量作为川东棉布消费的普遍水平。参见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③ 据侯杨方计算,明后期上海地区年产棉布4000万匹,用皮棉50万担(即50000000斤),可知生产一匹标准布需皮棉1.25斤。参见侯杨方:《明清上海地区棉花及棉布产量估计》,《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县份的最末流^{[23]304-305}。即使川东每一州县均能达到这一标准,整个川东地区的棉产量也仅在年均1000担左右,余下部分只能依赖外地输入。

重庆开埠前,输入川东的棉花主要来自于两湖地区,以长江航道为最主要的运输线路。据《云阳县志》记载:“嘉道中,此县商务尝大蕃盛,父老言西关外老街皆贾区,多湘、汉人,故城内外多两湖会馆,并有岳、常、澧、永、保诸府分馆,其业则棉布为多”。^{[24]卷十三·《礼俗中·工商》}而作为川东经济中心的重庆城,也活跃着大量经营棉花贸易的湖广商人。^{[25]36}两湖棉花进入川东的另一条通道是汉水。据严如煜记载,位于太平厅北部的大竹河可上通汉水,而位于太平厅南部的罗纹坝码头则可下达东乡、绥定和合州,因此,从汉水运抵大竹河的襄樊花布即可通过罗纹坝码头转运入川东地区^{[13]卷七·《险要下》}。然而,汉水的货物运载量毕竟远远低于长江主航道,因此,从这条路线运入的棉花大约只能供应巴山林林附近的城口、太平两厅。即使如毗邻的大宁县“其装絮衣被及絮布仍运自荆、宜”^{[20]卷一·《地理·物产》}。除湖广之外,陕西也有一部分棉花进入川东地区,当时也有人将“西花”与“广花”并称^{[20]卷十三·《食货门·制造》}。然而,陕西在当时也属于缺棉省份,因此,输入川东地区“西花”输入显然不会太多。

作为长江上游的商业枢纽,实际上当时川东地区的棉花输入量远远大于其本地的需求。据《巴县档案》记载,道光年间,每天在重庆朝天门码头起卸的棉花多达四五万斤^{[25]35}。英国领事禄福礼也曾在一份报告中提及,1886年(光绪十二年)从长江航道运抵重庆的棉花多达15万包^{[17]84}。以每包原棉重200斤计算,15万包棉花即为3000万斤,大约相当于川东地区全年棉花消费总量的3.5倍。如果再算上川东地区每年所输入的棉布成品,以及在运输过程中沿江发售的一部分,川东地区进口棉货的剩余量应该更大。多余的这一部分棉花或者直接转运到滇黔及四川省其余各地,或者在川东地区加工成棉布成品后远销外地。如《永川县志》即记载:“邑中种棉者少,贸广花成布,渍各色,如冻绿、墨青之类,行滇黔各省”^{[19]卷二·《舆地·物产》}。由此可见,在棉花和棉布贸易方面,川东地区也充当着整个长江上游地区的中转轴心。

(二) 日用百货

重庆开埠前,川东地区的手工业生产并不发达,许多日用百货需从外地贩运。而在关于清代川东地区的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广货”这一名称。从一些零散的记载中可以感觉到,这似乎是一类商品的统称,而且这类商品大多属于日用百货。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这类商品(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广帮”)的认识却十分模糊,而且存在很大的差异。如许檀^{[25]33}认为:“广货,大概是从广东运来的商货……也可能主要是由湖广商人贩运入川的。”严奇岩^{[26]24}认为,广货是“江浙、湖广等地的棉和土

布。”林秀静^[27]认为广帮是“从湖广地区来的商人”,《重庆工商史料》的编写者^{[28]24}则认为广帮是“由广东远销洋、广货来渝的客商。”这些理解似乎都抓住了“广货”(或“广帮”)在某一时期的某些特征,但又并不确切。本文即希望对“广货”一词的确切含义进行考证,进而理解重庆开埠前川东地区日用百货输入结构的深刻变化。

在乾隆至道光年间,“广货”一词较多地出现于与牙行有关的政府文告和诉讼案例之中。如乾隆年间重庆城152张牙帖之中,“广货帖”即占21张,其牙帖数量和上缴的税银数都仅次于“山货行”而位居第二。^{[25]31}从乾隆至道光时期的牙行诉讼案例中可知,当时的“广货行”应当是主要经营棉布和棉花,如嘉庆十五年,重庆城山货行和广货行即因争夺棉花和棉布的专卖权而大兴讼端。山货行称:“蒙恩轶主断令千厮门每年帮给广货行差银四十两,准蚁等山货行代卖楚布”^[29]。可见,楚布原是由广货行独家代理,而从“帮给差银四十两”可以看出,广货行经营的楚布贸易量是非常大的。同时广货行亦称:“渝城售卖白花向无专帖,向来由各客于相信之山广各行发卖”^[29]。棉花是重庆开埠前的输入品大宗,因此广货行经营的棉花贸易应该也是相当可观的。而从上文可知,重庆开埠前川东市场上的棉布和棉花大多来自于两湖地区,所以这里的“广货”应该主要指“来自于湖广地区的货品”。

另外,湖广周边地区的商品有时也被纳入“广货”的范围,如道光年间江西锡商刘永大即称:“花锡系投广货行出卖”^[30]。另外除棉布之外,“广货”还应包含更多的日用杂货品种。因为当时人往往将“广货”与“杂货”并称,如嘉庆十九年西帮脚夫李德世的诉状中即提到:“蚁等背运西帮山广杂货花布等物”^[31]。另外,在嘉庆十八年对于重庆城金紫灵壁二坊居民职业结构的统计中可见,“卖广货”被归于小商贩的经营范围,与“卖米、卖油、卖笋、卖菜、卖肉、卖鸡、卖蛋、卖炭、卖烟、卖布”相并列^{[25]37}。由此可见,在乾隆至道光时期,“广货”主要指来自于湖广及其周边地区的商品,虽然其种类除棉花和棉布之外尚不明确,但绝大多数应该是与民生日用密切相关的传统农副产品或手工业品。除湖广、江西之外,其它地区的日用百货也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川东市场,如福建的烟、江南的糖和纸张、陕西的毛货、广东的纱缎等。但从政府颁发的牙帖数量来看,其市场占有率应远不及广货。^{[25]32}

从咸丰年间开始,“广货”的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它逐渐特指由汉口(后来也包括宜昌)所转运的外洋布匹。早在道光末年,重庆就已有少数布匹字号,从汉口贩运洋布回重庆销售。^{[32]188}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汉口开埠、光绪三年(1877年)宜昌开埠后,通过这两个口岸转运到重庆的洋布数量激增。为了保证这一贸易顺

利进行，“广货铺”于光绪初年应运而生。他们主要从事居间贸易，即从字号手中大批购入洋布，然而转手卖给大布店和大水客。大约在光绪十年，广货铺成立了统一的行会组织——齐行会。^{[32]197}广货铺的中介职能类似于前文所提到的广货行，但不同的是，广货行以经营湖广土布、棉花和杂货为主，而光绪年间的广货铺则主要经营外洋布匹，这说明这个地区的商品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这一阶段，“广货”也指来自广东的货物。重庆开埠前，川东地区最大宗的输出品是鸦片、山货和药材。据海关调查报告记载，当时川东地区的鸦片主要运往江西、广东和广西。^{[17]53}而重庆城的山货和药材贸易也有相当一部分由广东商人经营，至晚到光绪初年，广帮商人兴建的古冈、顺德和广南三栈，已经成为重庆城山货药材唯一的交易场所。^{[33]7}正是由于川东商品的大量输出，来自于广东的回货也源源进入。据郑观应记载，当时输往川东地区的广东商货以布疋、洋纱、呢绒和棉花为大宗。^{[34]58}而光绪初年，山货商秦有成和刘海山从广东贩运回重庆的货物则包括参、茸、燕、桔、沉香、玉器等。^{[28]25}1889年（光绪十五年）粤商冯平山来重庆贸易之前，“在澳办得果皮，在港办得些砂仁、木香、桂皮等货。”^{[34]59}上述记载虽然都难以穷尽“广货”的种类，但从这些商品的名称来看，它们不仅包括广东本地的土特产，也包括经广东转运的外洋货物，不仅包括普通的民生日用品，也包括一些价格相对昂贵的奢侈品。

总而言之，“广货”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概念，其代表的商品种类、货物来源、运销渠道都在不断地变化。而从这一概念的演变来看，重庆开埠前川东地区日用百货输入的总变动趋势大体是：咸丰以前，以两湖及其周边地区的货品为主；咸丰以后，主要是来自汉口和广东的货品，而且其中洋货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不仅意味着不同的商品结构和消费习惯，同时也反映出这个市场与外界联系的方式和程度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三、清代前中期川东商品市场的总体特征

吴承明主张，对于明清国内市场和商业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于“那种历史上常见的《东京梦华录》式的市场繁荣，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影响社会变动的商业活动”^{[35]204}本文对于重庆开埠前川东商品市场的考察，也主要集中在进入长距离运销的大宗商品。因为这类商品对于市场条件有着较高的要求，如便利的仓储物流设施、畅通的信息传送渠道、实力雄厚的商人群体、稳定而丰富的货源等等。另外，这类商品的贸易切断了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并在他们之间加入了一条商业运作的长链。在这个过程中，商人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市场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掘商品的市场利润。因此，对于这类贸易的考察更能够说明一个市场的发展程度和时代

特征之所在。

从当时川东市场的商品输出结构来看，明显地体现出以农副土特产为主导的特征。但问题在于，这一类商品输出难以给这个市场带来持久的潜力。以粮食贸易来说，在清代前期，由于人口稀少，川东的粮食贸易还相当可观。但从嘉庆年间开始，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粮食的外运便逐年减少。从此，川东地区便失去了一项可供大宗外销的商品。土特产的输出更是如此，尽管在本文所考察的时段内，这一贸易还保持着比较旺盛的势头，但很多地区也已出现了自然资源匮乏的征象。而从咸丰年间到光绪年间川东鸦片种植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地方输出品市场疲软而采取的下策。所以，这种过分依赖于生态恩赐的经济发展模式，既对自然资源造成沉重的压力，又难以应付生态环境的变化，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小的。另外，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导的商品输出结构，还使得川东地区在国内市场体系中只能居于输出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地位，这对于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显然也是一个不利的限制因素。

从商品输入的角度看，当时的川东市场也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内向性特征。尽管上文中曾经叙述了棉花和广货的贸易，但这并不能证明川东市场已经主动地整合到国内市场体系之中。作为当时城乡居民最主要的服装用料，棉花和棉布对于大众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川东作为一个严重缺棉的地区，势必要从外地输入大量的棉货。因此，重庆开埠前川东地区的棉货贸易，与其说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发展，倒不如说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棉产量的匮乏，实在有一种迫不得已的意味。而对于当时川东的大部分地区来说，仍然是“绝无珍异为商市利柄，日用所需者天施地生，济之以人事，则不必取材异也，自足养欲而给求”^{[19]卷二·《物产》}。可见，一种低标准、小而全的自给自足模式仍然支配着当地经济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重庆开埠前的川东市场虽然体现出种种繁荣的征象，但在整个国内市场还处于比较内向和被动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2]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上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3] 邓亦兵·清代前期内陆粮食运输量及变化趋势——关于清代粮食运输研究之二[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3）.
- [4] 谢放·清前期四川粮食产量和外运量的估计问题[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88.
- [5] 王纲·清代四川史[M]. 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
- [6] 王尔鉴·巴县志[M].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刻本.
- [7] 秦和平·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
- [8] 吴炜·四川盐政史[M].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排印本.
- [9] 肖尧荣·乌江的“歪屁股”盐船[G]//政协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 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彭水文: 第九辑. 内部发行, 1996.
- [10] 王玉鲸. 增修万县志[M]. 同治五年(1866年)刻本.
- [11] 思宇. 四川桐油购销简史——《四川省志·粮食志》选登[J]. 粮食问题研究, 1995(5): 50.
- [12] 刘绍文. 城口厅志[M].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刻本.
- [13] 严如煜. 三省边防备览[M]. 道光十年(1830年)来鹿堂刊本.
- [14] 文康. 荣昌县志[M]. 光绪十年(1884年)增修本.
- [15] 朱言诗. 梁山县志[M]. 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 [16] 杜受祜, 张学君. 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 第二集[M].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 [17] 周景, 刘景修. 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 [18] 王鉴清. 续修涪州志[M]. 民国十七年(1928年)铅印本.
- [19] 许曾荫. 永川县志[M]. 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 [20] 高维岳. 大宁县志[M]. 光绪十二年(1886年)刻本.
- [21] 曹树基. 中国人口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 [22] 蓝炳奎. 达县志[M].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刻本.
- [23] 吕平登. 四川农村经济[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4.
- [24] 朱世鏞. 云阳县志[M].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铅印本.
- [25] 许檀. 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的重庆商业[J]. 清史研究, 1998(3).
- [26] 严奇岩. 论近代四川的山货及山货经济[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6): 23-29.
- [27] 林秀静. 清代中期重庆牙行组织的结构与演变[D]. 台北: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 2005.
- [28] 杨灿雪, 杨质斌, 夏荫枏, 李若愚. 洋行垄断下的山货业[G]//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 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重庆工商史料: 第一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2.
- [29] “千厮门山货行与广货行争卖红白花和布疋互控案”, 嘉庆十五年二月, 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 案卷号: 清 6-05-04886.
- [30] “本城康维新具告陈益茂违规屡讨帮费不给等情一案”,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 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 案卷号: 清 6-12-10477.
- [31] “太平门夫头谭秉清告李德世等违断强背杂货等情案”, 嘉庆十九年七月, 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 案卷号: 清 6-06-07091.
- [32] 卓德全, 王仲鼎, 周让伯. 洋布倾销和重庆布匹业的形成[G]//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 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重庆工商史料: 第一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2.
- [33] 朱君南, 等. 四川药材业在重庆经营史略[G]//四川省志编辑委员会.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二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 [34] 林辉锋. 晚清时期粤港渝贸易关系浅探[J]. 五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6(3).
- [35] 吴承明. 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G]//吴承明. 中国的现代化: 市场与社会.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责任编辑 张颖超

The Commodity Market of the Eastern Part of Sichuan Province Before the Founding of Chongqing Custom

ZHOU Lin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mainly about the commodity market of the eastern part of Sichuan Province before the founding of Chongqing Custom. It investigated both the import commodities and the export commodities, which exhibited a market with substantial capacity, integrated function and prosperous outlook. But meanwhile, it also hindered by two latent problems, that is, relying too much on the export of industrial product,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ther regions proved to be comparatively loose and passive. This phenomenon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is region.

Key words: the Eastern Part of Sichuan Province; the Founding of Chongqing Custom; commodity market; export commodities; import commodities